

神庙贸易视域下公元 1~3 世纪帕尔米拉商业网络构建*

车效梅 范超**

内容提要 叙利亚沙漠中的帕尔米拉是罗马帝国初期的重要商贸城市，其神庙贸易现象对研究古代近东地区特有的神庙经济模式意义重大。从城市本身出发，特殊区位条件带来的商贸优势和以神庙为依托的多元宗教体系为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的出现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外部环境而言，公元前后和平的外部环境、罗马帝国的保护支持和区域贸易网络格局的变动是帕尔米拉神庙贸易得以产生的重要时代背景。神庙积极参与商贸是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的突出特点和主要内容。帕尔米拉神庙不仅通过神职人员参与政府决策、传达神谕等方式影响帕尔米拉商业政策的制定，还利用其多重经济职能为往来商人团体提供便利。神庙贸易对帕尔米拉本身的繁荣、帕尔米拉商业网络的扩展和罗马帝国的经济收入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帕尔米拉 神庙经济 神庙贸易 商业网络

帕尔米拉 (Palmyra) 又名台德莫尔 (Tadmor)，位于叙利亚中部地区，是古代东西方商旅的重要中转站。作为典型的商队城市，帕尔米拉依托众多的商业据点和活跃的骆驼商队积极参与到罗马帝国与东方的长途贸易之中。公元 1~3 世纪是帕尔米拉发展的黄金期，城市及其腹地面积不断扩大，^① 商贸活动丰富。长途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促使帕尔米拉诸多纪念性建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多卷本）”（18ZDA213）阶段性成果。

** 车效梅，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城市史、中东城市化和丝路城市史；范超，山西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城市史。

① 公元 1 世纪至 3 世纪中叶帕尔米拉城的辐射范围西至埃梅萨 (Emesa)，东跨幼发拉底河，北抵安条克，南达叙利亚—阿拉伯沙漠；3 世纪中叶帕尔米拉帝国建立后，其疆域更是横跨亚、非两洲。

(包括神庙)拔地而起。尽管帕尔米拉的辉煌商贸史长期以来都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数量众多的帕尔米拉神庙^①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这些由富有商人捐赠的神庙建筑吸引了大量朝拜者,提升了这座沙漠城市的知名度;同时神庙也在城市对外贸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推动帕尔米拉商贸规模进一步扩大,神庙与商贸的良性互动不仅是帕尔米拉神庙贸易^②出现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更是城市能够迅速崛起成为罗马帝国近东地区商业中心的秘诀所在。

国外学界关于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西方古典作家著作和游记。罗马学者老普林尼、阿庇安、约瑟夫斯、琉善的作品^③

-
- ① 鉴于帕尔米拉人规模庞大的商业网络和分布广泛的考古遗存,本文中提到的帕尔米拉神庙是指帕尔米拉人在城市内部和各商业据点建立的所有庙宇。
- ② 帕尔米拉神庙贸易并非传统意义上由神庙主导的贸易,而是指罗马帝国初期由帕尔米拉人在其商业网络范围内建立的神庙通过直接参与或间接干预商贸等方式深度介入罗马帝国长途贸易的现象,神庙贸易的重要性集中表现在对帕尔米拉跨区域贸易的经济推动作用上。
- ③ 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描述了帕尔米拉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帕尔米拉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和富人的泉水而闻名,它的田野四周环绕着一圈巨大的沙土;而且出于自然条件的缘故,它仿佛天生与世隔绝,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这两个至高无上的帝国被命运牵着,它们之间发生争吵的第一时刻,总能引起双方的注意。阿庇安的《罗马史·内战史》记载了公元前41年安东尼欲劫掠帕尔米拉财富一事,这是罗马与帕尔米拉之间有联系的最早证据;当克利奥帕特拉回到家乡时,安东尼派遣了一支骑兵部队到离幼发拉底河不远的帕尔米拉去劫掠,并对那里的居民提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指控,说他们住在罗马人和帕提亚人的边界上,却避免站在他们任何一边,因为他们是商人,从波斯运来印度和阿拉伯的货物并在罗马领土内出售。但事实上,安东尼的目的是想让他骑兵富裕起来。然而,帕尔米拉人先得到了警告,他们把财产转移到了河对岸,并驻扎在河岸上,准备射杀任何攻击他们的人,因为他们是熟练的弓箭手。骑兵在城内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弗拉维奥·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中首次提到了帕尔米拉的闪米特语名称台德莫尔,这一名称暗指帕尔米拉绿洲之中丰富的棕榈树;所罗门又到达叙利亚的北部旷野,并占有了它,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极大的城,距叙利亚北部有两天的路程,离幼发拉底河有一天的路程,而离巴比伦有六天的路程。在远离叙利亚有人居住的地方建立这座城市的原因是,在更远的地方没有水,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找到泉水和井水。因此当他建造了这座城市,用非常坚固的城墙包围它时,他给它起名叫台德莫尔,叙利亚人仍然这样称呼它,而希腊人则叫它帕尔米拉。琉善的《叙利亚女神》(De Dea Syria)则详细总结并归纳了当时叙利亚地区神灵的种类与数量,这对于研究帕尔米拉宗教和神庙具有重要意义。参见 Pliny, *Natural History*, Vol. 6, trans. by H. Rackham, Lond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8; Appian, *Roman History*, trans. by Horace White, Lond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p. 892; Flavius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Vol. VIII, trans. by Louis H. Feldman, Lond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153-154; Daniel Richter, "Lucian of Samosata," in Daniel S. Richter, William A. Johns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econd Sophistic*,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328-329。

为后人了解公元1~3世纪帕尔米拉的地理环境、商贸历史和宗教信仰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而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所记载的贸易路线、商品种类为帕尔米拉跨区域贸易提供了重要参考。^① 第二类是西方学者对帕尔米拉神庙相关考古材料的整理、释读与研究。20世纪以来，帕尔米拉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涉及碑刻铭文、^② 神庙遗址、^③ 宴会请柬、^④ 公共和葬礼肖像群^⑤ 四大类，这些数量众多的考古遗存为帕尔米拉神庙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帕尔米

-
- ① Lionel Casson,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2.
- ② 截至目前，帕尔米拉出土的神庙遗存中的碑文和铭文均被收录于帕尔米拉阿拉米语文本库 (PAT)、叙利亚希腊和拉丁铭文文库 (IGLS)、帕尔米拉铭文清单 (Inv) 中。参见 Delbert R. Hillers, Eleonora Cussini, *Palmyrene Aramaic Texts*,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Jean-Baptiste Yon, *Inscriptions Grecques et Latines de la Syrie. Tome XVII-Jascicule 1. Palmyre*, Beyrouth: Presses de l'Ifpo, 2012; Javier Teixidor, *Inventaire des Inscriptions de Palmyre*, Beyrouth: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de Beyrouth, 1965.
- ③ 帕尔米拉现存的六座神庙遗址分别是1929年由法国考古队发掘的贝尔神庙 (The Temple of Bel)、1954~1956年由瑞士考古队发掘的巴尔夏明神庙 (The Temple of Baalshamin)、由波兰考古队发掘的阿拉特神庙 (The Temple of Allat)、由叙利亚考古队发掘的纳布神庙 (The Temple of Nabu)、1980年由法国发现的阿苏神庙 (The Temple of Arsu) 和21世纪初发现的拉巴西尔神庙 (The Temple of Rabaseire)，神庙遗址的发掘是研究帕尔米拉神庙经济的重要前提。参见 Richard Stoneman, *Palmyra and Its Empire: Zenobia's Revolt Against Rome*,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 12; Ernest Will, "Le Développement Urbain de Palmyra: Témoignages épigraphiques anciens et nouveaux," *Syria*, Vol. 60, 1983, p. 76; Michał Gawlikowski, "Le Tarif de Palmyre et le Temple de Rab'Asirê,"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Vol. 156, No. 2, 2012, pp. 765-780.
- ④ 20世纪中后期考古工作者在贝尔、纳布和阿苏神庙遗址中发现了印有图像和文字的陶片，这些陶片成为研究帕尔米拉宗教生活最丰富的信息来源。陶片的主要内容是宴会请柬 (tesserae)，由此为了解帕尔米拉商旅保护神的形象、职责和神庙内部节庆市场情况提供了基础材料。参见 Harald Ingholt, Henri Seyrig, Jean Starcky, Andre Caquot, *Recueil des tessères de Palmyr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nthner, 1955.
- ⑤ 2012年开始的由丹麦古典学教授拉贾指导的帕尔米拉肖像项目 (The Palmyra Portrait Project) 将所有可用的帕尔米拉公共和葬礼肖像编号记入数据库进行分析，它们提供的关于帕尔米拉祭司的研究样本有助于我们探究神职人员与城市商贸之间的密切联系。帕尔米拉的葬礼肖像构成了罗马世界最大的肖像集，有超过2000件文物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古董市场以及被私人收藏，截至目前数据库拥有3000多幅肖像画，参见 Tracey Long, Annette Højen Sørensen, *Positions and Professions in Palmyra*, Copenhagen: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2017, p. 115.

拉神庙研究的方向和内容发生新的变化,^①更多的学者开始从神庙的角度探讨帕尔米拉经济与宗教生活间的互动关系,其中格劳特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代表。^②尽管这些成果对学界关于帕尔米拉神庙重要性的认知是一种巨大的贡献,但其对神庙在贸易方面的研究仍不够系统。所以,无论是从微观层面探讨神庙对商贸活动和商人慈善行为的鼓励,还是从宏观层面研究神庙对帕尔米拉贸易网络的贡献等,都还有较大的深化空间。

国内帕尔米拉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一方面,有关帕尔米拉的叙述散见于不同著作,^③2022年出版的《巴尔米拉:一座失落的罗马边城》^④是国内目前唯一关于帕尔米拉的中文译著;另一方面,学者们更侧重于探究丝绸之路对帕尔米拉商贸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帕尔米拉这一城市国家本身的兴衰历程,^⑤对帕尔米拉神庙的专门研究数量较少且多停留在考古层面。^⑥本文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出发,以神庙经济论^⑦为立足点,着

- ① 20世纪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帕尔米拉神庙建筑和城市宗教生活展开,如泰克西多尔的《帕尔米拉万神殿》和H. J. W. 德里弗斯等学者编写的《帕尔米拉的宗教》等,参见 Javier Teixidor, *The Pantheon of Palmyra*, Leiden: Brill, 1979; H. J. W. Drijvers, *The Religion of Palmyra*, Leiden: Brill, 1976。
- ② 格劳特在博士学位论文《帕尔米拉神庙在罗马近东长途贸易中的作用》中初步探究了帕尔米拉神庙在商贸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参见 John Berkeley Grout, *The Role of Palmyrene Temples in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Roman Near East*, London: Royal Holloway and Bedford New College, 2016。
- ③ 哈全安:《中东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亓佩成:《古代西亚文明》,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
- ④ [法]保罗·韦纳:《巴尔米拉:一座失落的罗马边城》,闫素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 ⑤ 徐晓旭、贾瑞霞:《丝绸之路与希腊化城市》,《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期,第113~126页;张爽:《试论早期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以丝路沿线的主要国家为中心》,《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8期,第37~42页;裔昭印:《论早期罗马帝国的东方贸易及其社会文化影响》,《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1年第4期,第3~9页;王乐、赵丰:《从中国到罗马——帕尔米拉出土丝绸图案体现的艺术交流》,《艺术百家》2018年第5期,第195~202页;龙沛:《帕尔米拉的兴衰沉浮及文明交往特征》,《光明日报理论版·世界史》2021年11月15日,第14版;亓佩成、赵长福:《帕尔米拉王国的发现及其历史》,《惠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78~84页。
- ⑥ 高关中:《帕尔米拉古城的前世今生》,《百科知识》2015年第20期,第59~62页。
- ⑦ 神庙经济论是19世纪20~30年代由安东·戴梅尔(Anton Deimel)及其学生提出的研究早期两河流域神庙国家或神庙城市起源的重要理论。神庙对城市经济命脉的控制是神庙经济论的主要内容,它既包括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也暗示了神庙对商贸活动的强力干预,神庙经济论中关于神庙与商贸密切关系的论述为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20世纪末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进一步发展了神庙经济理论,他从经济行为和商品转换的角度分析了神庙对经济生活产生的实际影响,为现代学者研究帕尔米拉神庙经济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参见 David Wengrow, "Prehistories of Commodity Branding,"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9, No. 1, 2008, p. 20。

重分析公元 1~3 世纪帕尔米拉独具特色的神庙贸易现象。通过探讨帕尔米拉的神庙如何凭借多重职能和强大影响力积极参与城市的贸易活动,以期揭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神庙在古代近东城市商业网络发展、繁荣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 地缘优势与宗教包容: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的基础

帕尔米拉是罗马帝国时代著名的叙利亚绿洲商贸城市,其居民由阿拉伯沙漠游牧民族与该地说阿拉米语的族群融合而成。帕尔米拉在罗马帝国初期扮演着东西方贸易中转站和大宗商品集散地的重要角色。从城市这一微观视角出发,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得益于独特的区位优势,还与多元的宗教体系息息相关。帕尔米拉城内神庙作为叙利亚地区宗教崇拜跨区域传播的中心,在推动神庙贸易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神庙参与帕尔米拉长途贸易的具体方式。

特殊的生态环境奠定了帕尔米拉经济活动的基调,优越的地理条件则为帕尔米拉带来诸多商贸优势。生态环境是帕尔米拉发展商业而非农业的重要影响因素。贝都因人将帕尔米拉周边景观称为干旱的草原(bādiya),^①其年平均降雨量约为 125 毫米,这低于大麦(200 毫米)和小麦(250 毫米)等谷物的标准需水量,也低于近东干旱地区农业定居点和沙漠牧场之间的传统界限值,^②因此发展农业对帕尔米拉来说是不现实的,帕尔米拉及其腹地水源极为分散,城市生活用水尚需从外部引入,农业用水情况更为严峻。因此,相较于对水源需求大且对土壤肥力有严格要求的农业来说,发展商业是帕尔米拉人更省时省力的选择。

作为穿越叙利亚沙漠的必经之地,帕尔米拉商贸优势明显。从区域自然地理条件来看,帕尔米拉是穿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沙漠时的重要绿洲节点,帕尔米拉南部和东南部是一片荒漠,西南部、北部和东北部则被

① Jørgen Christian Meyer, *Palmyrena: Palmyra and the Surrounding Territory from the Roman to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 Oxford: Archaeopress, 2017, p. 17.

② Joan Campmany Jiménez, Iza Romanowska, Rubina Raja, Eivind Heldaas Seland, "Food Security in Roman Palmyra (Syria) in Light of Paleoclimatological Evidence and Its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PLoS ONE*, Vol. 17, No. 9, 2022, p. 3.

山脉和高原所包围。从生存条件来看,绿洲周边的井水、泉水和蓄水池等为往来商团、旅行者以及随行牲畜^①提供了宝贵的水源。^②从运输条件来看,帕尔米拉处于地中海东岸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中心位置,这意味着帕尔米拉到两地的直线距离加起来相比其他城市更短,且帕尔米拉距地中海港口城市较近,商品的转运工作比较容易。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帕尔米拉位于罗马和帕提亚两大帝国的交界处,是两国贸易中介的不二选择,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东方商品由帕尔米拉转运到罗马帝国境内。帕尔米拉与帕提亚帝国经济关系密切,帕提亚帝国许多城市都活跃着帕尔米拉商人的身影。^③

帕尔米拉的多元信仰^④是帕尔米拉神庙贸易发展壮大的另一基础,而包容的宗教氛围和形式多样的商旅之神有助于帕尔米拉跨区域商贸活动的开展。包容的宗教环境既是帕尔米拉社会形成的基本前提,也是帕尔米拉商贸繁荣的突出表现。许多邻近部族为了获得珍贵的水资源,或为了躲避游牧民族的侵袭,从原本的定居点迁移到了绿洲,每个群体都带来了自己的神灵,帕尔米拉万神殿长长的神祇名单即为明证,帕尔米拉因此成为叙利亚沙漠的宗教中心。这些部族构成了帕尔米拉社会的核心,帕尔米拉铭文记录了30多个部落的名字,其中有17个主要部落。^⑤公元2世纪时帕尔米

① 穿越沙漠的贸易商路的繁荣是骆驼驯化技术在叙利亚地区推广的结果,这同样是帕尔米拉特殊地理位置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参见〔美〕理查德·W. 布利特《骆驼与轮子》,于子轩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第60页。

② Jørgen Christian Meyer, *Palmyrena: Palmyra and the Surrounding Territory from the Roman to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 Oxford: Archaeopress, 2017, pp. 17–18.

③ I. A. Richmond, "Palmyra under the Aegis of Rome,"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53, No. 1, 1963, p. 44.

④ 帕尔米拉有着复杂的宗教信仰系统和多元化的神灵崇拜。城市主神贝尔(Bel)享有崇高地位,本地神主要有正义之神和伊夫卡泉(Efqa)守护神亚日波尔(Yarhibol,意为贝尔的助手)、太阳神马拉克贝尔(Malakbel)、月神阿格里波尔(Aglibol,意为贝尔的使者)等。对邻近地区神灵的崇拜是帕尔米拉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来自黎凡特的巴尔夏明和阿斯塔特(Astarte),来自巴比伦的波尔、纳布,来自叙利亚北部的阿塔伽提斯(Atargatis)和哈达德(Hadad),以及来自阿拉伯的阿拉特、沙马什(Shamash)和阿布加尔(Abgal)等神祇。参见 Michael Sommer, *Palmyra: A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177.

⑤ Trevor Bryce, *Ancient Syria: A Three Thousand Year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82.

拉的居民主要由四个部落构成，每个部落在各自区域内敬献自己部落的守护神。^① 帕尔米拉的部落信仰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政治生活。移民到帕尔米拉的不同部族也为创造新的宗教信仰体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贝尔神庙则是各个部族将各自的神灵信仰融入绿洲社会的重要宗教空间。除主神贝尔外，这座沙漠中的小城镇存在着60多位神灵。^② 来自不同地区的神灵及其与本地神灵之间的密切联系，^③ 事实上反映了帕尔米拉信仰的包容性，而这也是帕尔米拉作为多个国家和地区商队必经地的首要条件。

帕尔米拉宗教中有关商贸的元素主要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商旅保护神，源自阿拉伯人的阿苏神便是其中之一。^④ 从阿苏神的形象来看，骆驼是阿苏神的主要化身，对阿苏的崇拜实际上是对神圣动物骆驼的崇拜。骆驼既是游牧民族的财富、帕尔米拉商人的资本，也是沙漠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而从阿苏神的职责来看，骆驼作为商队保护者，为穿越沙漠的商团指明前进方向。^⑤ 帕尔米拉人对阿苏神的崇拜一方面突出了骆驼作为商队驮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商队对近距离贸易的安全需求。帕尔米拉民间信仰的特色在于主神崇拜之外还存在精灵崇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吉内耶(Ginnaye)，吉内耶在帕尔米拉出土的某些阿拉米语文本中也写作盖德(Gad)。^⑥ 精灵吉内耶的宗教功能与罗马的墨丘利神基本相同，二者都是个人及其商队、牛群和村庄的守护神。^⑦ 帕尔米拉极其重视商旅保护神在城市

-
- ① Richard Stoneman, *Palmyra and Its Empire: Zenobia's Revolt Against Rome*,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 68.
- ② Andrew M. Smith II, *Roman Palmyra: Identity, Community, and State Formatio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9.
- ③ 如贝尔神的配偶在帕尔米拉被描绘为女神阿斯塔特；贝尔、阿格里波尔、亚日波尔形成了帕尔米拉一组常见的三主神，另外一组包括巴尔夏明、阿格里波尔和马拉克贝尔三个神，参见王阳《试论罗马对东地中海地区的治理——共和国后期至帝国前期》，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9，第129页。
- ④ M. I. Rostovtzeff, "The Caravan-gods of Palmyra,"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22, No. 1, 1932, p. 110.
- ⑤ M. I. Rostovtzeff, "The Caravan-gods of Palmyra,"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22, No. 1, 1932, pp. 111 - 112.
- ⑥ John Berkeley Grout, *The Role of Palmyrene Temples in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Roman Near East*, London: Royal Holloway and Bedford New College, 2016, p. 23.
- ⑦ H. J. W. Drijvers, *The Religion of Palmyra*, Leiden: Brill, 1976, p. 4.

中享有的独特地位,不仅为这些神灵塑像和修建庙宇,^①而且还在与民众日常生活高度相关的雕塑和宴会请柬中大量描绘这类神灵。^②

值得注意的是,神庙既是帕尔米拉多元宗教信仰体系的重要载体,也是神庙贸易活动的主要场所。杜拉·欧罗普斯(Dura Europos)、沃洛吉西亚斯(Vologesias)等地的帕尔米拉神庙大多充当商队旅馆(caravanserai),为往来商人提供庇护和补给,而城市内部的神庙不但分散位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而且靠近城市的公共建筑和交通要道,^③其商贸活动辐射整个帕尔米拉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帕尔米拉神庙在长途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呈现多功能化态势。帕尔米拉神庙既通过展示表彰商队的铭文鼓励商贸活动,也通过创办节庆市场促进商品交换,还通过供奉捐赠人雕像直接展示帕尔米拉商人的风采。

贝尔神庙遗址发掘出与帕尔米拉商贸活动高度相关的考古材料。贝尔神庙出土了6篇商队铭文,占这类铭文总数的17.14%,^④占神庙出土铭文总数的11.53%,^⑤数据表明贝尔神庙多次通过展示商队铭文的方式对帕尔米拉商贸活动进行激励。此外,贝尔神庙宴会厅排水沟中发现的宴会请柬证实了骆驼是帕尔米拉商队贸易的重要运输工具。^⑥贝尔神庙内部一根柱子上的涂鸦也侧面反映了神庙与长途贸易活动的间接联系,涂鸦描绘了一艘满载货物的木筏,而这种木筏曾被用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下游运输。^⑦

-
- ① Eleonora Cussini, *A Journey to Palmyra*,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5, p. 7; Harkes Gates, *Ancient Cities: The Archaeology of Urban Lif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Egypt, Greece and Ro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390-391.
 - ② Tracey Long, Annette Højen Sørensen, *Positions and Professions in Palmyra*, Copenhagen: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2017, pp. 109-114.
 - ③ Michael Sommer, *Palmyra: A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172.
 - ④ Jean-Baptiste Yon, *Les notables de Palmyre*, Beyrouth: Presses de l'Ifpo, 2002, pp. 263-264.
 - ⑤ John Berkeley Grout, *The Role of Palmyrene Temples in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Roman Near East*, London: Royal Holloway and Bedford New College, 2016, pp. 208-264.
 - ⑥ 请柬显示三匹骆驼将所驮商品献给城市主神贝尔,参见 Harald Ingholt, Henri Seyrig, Jean Starcky, Andre Caquot, *Recueil des tessères de Palmyr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authier, 1955, No. 58, 117, 179.
 - ⑦ Jørgen Christian Meyer, Eivind Heldaas Seland, Omar al-As'ad et Andreas Schmidt-Colinet, "A Raft, a Ship and a Lighthouse in the Desert. Fluvial and Maritime Graffiti from Ancient Palmyra," *Syria. Archéologie, Art et Histoire*, Vol. 97, 2020, pp. 305-314.

为了纪念公元 129 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来访一事，帕尔米拉人修建了巴尔夏明神庙。^① 神庙中关于捐赠者的铭文展现了财富从商人流向神庙的动态过程，神庙中保存最完整的铭文被展示在捐赠人雕像放置台的旁边，这尊雕像由帕尔米拉元老院奉献，以纪念奥古斯都城市居民阿格里帕（Agrippa）为神庙捐赠财产。^② 此外，巴尔夏明神庙出土了一篇献给索阿多斯（Soados）的商队铭文。^③ 这些关于帕尔米拉社会名流的铭文，反映了神庙建设本身就是帕尔米拉商队财富的重要表现，而且巴尔夏明神庙依然像贝尔神庙那样，作为表彰铭文的展示场所而发挥作用。

纳布神庙于公元 1 世纪末 2 世纪初建成，但是公元 2 世纪中期柱廊街占用了神庙的北部空间，使得该遗址呈现特殊的梯形。^④ 与贝尔神庙一样，纳布神庙的归属也存在争议。^⑤ 在纳布神庙遗址中发现的帕尔米拉宗教宴会请柬，表明该神庙存在一个官员监督下的节庆市场（*un agoranome de panégyrie*），^⑥ 这印证了上文提到的神庙作为大型商贸活动举办场所的论断，法国学者让·巴斯蒂特·杨推测纳布神庙的圣日为马努斯节。^⑦ 拉巴西尔神庙的情况比较特殊，直到 21 世纪初高利科夫斯基才确定了这座神庙的地点和部分结构。尽管从已知资料来看拉巴西尔神庙的面积很小，^⑧ 但这位神灵

-
- ① Javier Eixidor, *The Pagan God: Popular Religion in the Greco-Roman Near E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32. 巴尔夏明神庙的建成时间为公元 130/131 年。
 - ② Jean-Baptiste Yon, *Inscriptions Grecques et Latines de la Syrie. Tome XVII-fascicule 1. Palmyre*, Beyrouth: Presses de l'Ifpo, 2012, pp. 36 - 38.
 - ③ Delbert R. Hillers, Eleonora Cussini, *Palmyrene Aramaic Texts*,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9, No. 0197. 索阿多斯系列铭文主要包括出土于巴尔夏明神庙的公元 132 年铭文、出土于阿拉特神庙的公元 144 年铭文和发现于查拉克斯·斯帕西努、沃洛吉西亚斯等地的公元 145 年铭文。
 - ④ Arthur Segal, *Temples and Sanctuaries in the Roman East*, Oxford: Short Run Press, 2013, pp. 92 - 93.
 - ⑤ Ted Kaizer, *The Religious Life of Palmyra: A Study of the Social Patterns of Worship in the Roman Period*, Stuttgart: Ftzan Steiner Verlag, 2002, pp. 91 - 99.
 - ⑥ Harald Ingholt, Henri Seyrig, Jean Starecky, Andre Caquot, *Recueil des tessères de Palmyr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nthner, 1955, p. 89, No. 687, 688.
 - ⑦ 马努斯（Mannos）是一位主要存在于帕尔米拉的军事神灵，参见 Jean-Baptiste Yon, *Inscriptions Grecques et Latines de la Syrie. Tome XVII-fascicule 1. Palmyre*, Beyrouth: Presses de l'Ifpo, 2012, p. 263。
 - ⑧ John Berkeley Grout, *The Role of Palmyrene Temples in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Roman Near East*, London: Royal Holloway and Bedford New College, 2016, p. 67.

在帕尔米拉威望很高，一方面是因为这座神庙较城市内其他神庙存在时间更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关税表以它作为参考点，^① 这从侧面反映了拉巴西尔神庙与城市经济之间的重要联系。此外，“拉巴西尔”在当地语言中直译为“被锁的主人”。考虑到该神灵的名字、其锁链的形象^②以及神庙靠近市场的位置，我们可以将拉巴西尔视为一个与奴隶贸易相关的神，^③ 这表明帕尔米拉不仅存在奴隶贸易的情况，而且神庙很可能作为奴隶的安置场所而存在。

二 帝国保障与和平交往：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的外部条件

如果说区位优势带来的繁荣商贸活动和由此产生的多元神灵崇拜体系为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和平的时代环境、罗马帝国的保护支持^④和区域贸易网络格局的变动则是帕尔米拉商贸活动丰富和宗教文化广泛传播的重要条件。

公元前后，古代世界出现了囊括整个欧亚大陆诸文明的经济贸易网络。首先，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凿空”西域共同推动了东西交往大动脉——陆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公元前1世纪印度洋季风规律的发现、应用，造船技术的提高极大地刺激了远洋贸易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也粗具雏形，由帕尔米拉人开创的陆海河联运的贸易路线被全部纳入已知世界的丝路网络之中。其次，亚历山大远征中亚、印度，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帝国，希腊

① M. I. Rostovtzeff, *Seleucid Babylonia: Bullae and Seals of Clay with Greek Inscrip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2, p. 3.

② 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的拉巴西尔雕像是个戴着铁甲的战士，左手拿着一根长杖和两条长链，两侧是一对狮子，每只狮子头上都栖息着一只鹰。参见 Jean Starcky, Michał Gawlikowski, *Palmyre*, Paris: Librairie d'Amerique et d'Orient, 1952, p. 81.

③ John Berkeley Grout, *The Role of Palmyrene Temples in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Roman Near East*, London: Royal Holloway and Bedford New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6, p. 221.

④ 从公元前64年庞培征服叙利亚至公元272年帕尔米拉帝国灭亡的300多年，帕尔米拉大部分时间以罗马帝国附属城市或国家的身份而存在，因此其受罗马影响较深。尽管芝诺比娅建立了地跨亚非的商业帝国，但保罗·韦纳指出将这一政权的存在视为分裂罗马帝国的传统观点失之偏颇，芝诺比娅与其他来自近东地区的皇帝一样追求的是罗马正统的地位，从这一层面来看，即使在独立时期芝诺比娅依旧认为帕尔米拉是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法〕保罗·韦纳《巴尔米拉：一座失落的罗马边城》，闫素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第7页。

文化也伴随亚历山大东征和诸多希腊化王国的建立得到广泛传播。至公元1世纪初,随着罗马和平的建立,近东地区汇聚希腊化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贸易枢纽城市如帕尔米拉、查拉克斯·斯帕西努(Charax Spasinou)通过彼此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有效地贯通了丝绸之路西段的商业贸易网络。最后,公元前后欧亚大陆形成了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并立的局面,四大帝国为不同地区的商贸往来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作为罗马帝国东方边境城市,帕尔米拉的繁荣便得益于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阿拉伯和印度之间的跨国贸易活动。

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的建立不仅结束了自共和国时期以来频繁的对征服战争,同时也标志着“罗马和平”的到来,^①正如斯多噶派哲学家埃皮克泰德(Epictetus)强调的那样:“恺撒(屋大维)为我们带来的和平是多么伟大!帝国境内不再有战争和冲突,不再有横行无忌的海盗;在大陆上人们可以不分昼夜地穿行,在海上可以从日出航行到日落。”^②奥古斯都时代以来开明的政治与和平的环境为罗马帝国的商业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一方面,帝国版图的扩展与农业生产量的提高促使帝国人口迅速膨胀,罗马也因此成为东西方商品销售的重要市场;另一方面,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奢侈品加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罗马与东方的经济往来。罗马帝国繁荣的东方贸易,可从出土的帕尔米拉铭文材料中和古典史家所记从罗马埃及开往印度船只的数量上窥见端倪。^③而帕尔米拉也因罗马皇帝的商业鼓励政策和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逐渐从叙利亚沙漠中的小村庄发展为罗马、帕提亚之间政治博弈的战略据点和波斯湾至东地中海商路的贸易枢纽城市。

帕尔米拉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就引起罗马皇帝的关注,如公元18年提比略皇帝的养子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派帕尔米拉使者亚历山大罗斯(Alexandros)前往帕提亚的附属国梅塞尼(Mesene,首府即Charax Spasinou)进

-
- ① 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180年大约200年的时间,史称“罗马和平”(Pax Romana),在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的统治达到辉煌的顶峰,其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
 - ② 陈思伟:《埃及与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贸易及其在罗马帝国经济中的地位》,《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7页。
 - ③ Gary K. Young, *The Long-Distanc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Roman East and Its Political Effects* 31B. C. -A. D. 305, Tasmania: University of Tasmania, 1998, p. 107.

行考察;^① 公元 129 年哈德良皇帝正式访问帕尔米拉;^② 而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诸帝对帕尔米拉也给予诸多优待。^③ 帕尔米拉并入罗马叙利亚行省后,^④ 依旧保持着一定的自主性,这种半独立的地位不仅造就了帕尔米拉自由宽松的社会氛围,也是帕尔米拉能够充当两大帝国贸易中介的根本原因。作为帝国边境重要的“门户城市”,帕尔米拉对罗马与东方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意义重大,因此罗马皇帝十分重视该城的道路通行能力并为其颁布多种贸易优惠政策,如公元 75 年罗马帝国在帕尔米拉与苏拉城(Sura)之间修建了一条大道;^⑤ 公元 137 年制定的关税表明,罗马赋予了帕尔米拉自行制定本城市交易物品税率的权力;^⑥ 公元 212 年,在罗马皇帝卡拉卡拉统治期间,帕尔米拉获得罗马殖民城市地位,从而免除向帝国上交赋税的义务。^⑦

和平的环境和强大的帝国支持固然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公元 2 世纪的帕尔米拉商贸鼎盛状态亦从罗马军事行动导致的波斯湾—东地中海贸易网络格局变化中受益。一方面,帕尔米拉的竞争对手衰落,如 106 年纳巴泰王国被图拉真皇帝吞并为阿拉伯行省,以其首都佩特拉为中心的跨国贸易重要性迅速下降;116 年、165 年、198 年罗马军队三次劫掠塞琉西亚—泰西封,帕提亚京畿地区经济贸易急速萎缩;公元 2 世纪期间帕提亚帝国内境的哈特拉(Hatra)也多次被罗马军队围攻。^⑧ 这些城市的相对衰落,促

-
- ① Delbert R. Hillers, Eleonora Cussini, *Palmyrene Aramaic Texts*,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69, No. 2754.
 - ② Delbert R. Hillers, Eleonora Cussini, *Palmyrene Aramaic Texts*,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69, No. 1374.
 - ③ [美] 罗斯托夫采夫:《商队城市》,马百亮译,商务印书馆,2023,第 90 页。
 - ④ 亓佩成、赵长福:《帕尔米拉王国的发现及其历史》,《惠州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第 79 页。
 - ⑤ Andrew M. Smith II, *Roman Palmyra: Identity, Community, and State Formatio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4.
 - ⑥ John F. Healey, *Aramaic Inscriptions and Documents of the Roman Period*, Textbook of Syrian Semitic Inscriptions, Vol. 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64.
 - ⑦ Joan Campmany Jiménez, Iza Romanowska, Rubina Raja, Eivind Heldaas Seland, “Food Security in Roman Palmyra (Syria) in Light of Paleoclimatological Evidence and Its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PLoS ONE*, Vol. 17, No. 9, 2022, p. 4.
 - ⑧ Andrew M. Smith II, *Roman Palmyra: Identity, Community, and State Formatio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

使帕尔米拉顺利地垄断从叙利亚至波斯湾的贸易路线。另一方面，帕尔米拉的合作伙伴地位上升。如位于波斯湾顶端的帕提亚城市查拉克斯·斯帕西努是帕尔米拉东方贸易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罗马帝国对帕提亚帝国的多次军事打击，尤其116年图拉真对波斯湾地区的攻占，^①有利于查拉克斯保持其半独立地位，从而有效突破帕提亚的封锁、维持与帕尔米拉的商业联系。3世纪萨珊帝国建立后，波斯人吞并查拉克斯并结束了当地的半独立王国，从而对帕尔米拉的东方贸易造成重创，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帕尔米拉与查拉克斯之间的共生关系。

文明“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促使帕尔米拉成为罗马帝国东方的多元宗教与文化交汇之地，因此帕尔米拉能够充分吸收各大文明的成果。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的传统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帕尔米拉神庙对城市商业活动的干预事实上延续了早期两河流域和埃及神庙对贸易的垄断行为，^②埃及较大的神庙一般都拥有自己的商船，某些商船还参与了当时的海外贸易，^③这与帕尔米拉在海外的商业发展有着一定的相似性。^④第二，帕尔米拉也吸取了当时罗马近东神庙参与贸易的经验，即在神庙内专设节庆市场，节日庆典既是信徒宗教虔诚的表现，亦可作为节日集市服务于城市经济。^⑤唯有地区范围内面积较大和影响力较强的神庙才有能力完成此项活动，如杰拉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大马士革的朱庇特神庙以及阿帕美亚的宙斯·贝洛斯神庙等，在帕尔米拉扮演相同角色的是贝尔神庙和纳布神庙。

-
- ①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 LXVIII, Lond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 ② J. Divad Schloen, *The House of the Father as Fact and Symbol: Patrimonialism in Ugarit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1, p. 81.
- ③ Elizabeth Goring, Cyril Aldred, Nicholas Reeves, John Ruffle, *Chief of Seers Egyptian Studies in Memory of Cyril Aldr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94.
- ④ 红海沿岸科普托斯 (Coptos) 的铭文描写了帕尔米拉船主扎布达拉斯 (Zabdalas) 自费捐赠神庙的部分建筑，从而受到了来自同一城市的商人同事们的称赞与感谢。参见 Katia Schorle, "Palmyrene Merchant Networks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Competitive Markets", in Hakon Fiane Teigen, Eivind Heldaas Seland, eds, *Sinews of Empire: Networks in the Roman Near East and Beyond*, Oxford: Oxbow Books, 2017, p. 151.
- ⑤ 节庆市场的举办场所通常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为宗教节日的知名度高，越盛大的节日庆典对周围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强；二为基础设施完善，交易场所、旅馆等建筑对外来商人团体十分重要。参见 Ramsay MacMullen, "Market-Days in the Roman Empire," *Phoenix*, Vol. 24, No. 4, 1970, p. 336.

第三，南部游牧民族的商贸传统对帕尔米拉神庙参与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① 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民族是帕尔米拉人口的重要来源之一，鼓励神职人员参与长途贸易作为南部游牧民族重要的商贸传统被帕尔米拉人承继，贝尔神庙关于商队的壁画上出现了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种种宗教元素，^② 这表明神职人员可能直接参与了帕尔米拉的长途贸易。此外，帕尔米拉在很多方面都与活跃在古代阿拉伯半岛北部的纳巴泰人非常接近，无论是共同受益于贸易而发展为地区商业枢纽的中心城市，还是神庙与商贸活动间的密切关系。

三 多元空间与区域辐射：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的运作模式

神庙在帕尔米拉贸易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神庙神职人员利用其社会地位影响帕尔米拉商业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帕尔米拉神庙祭司一般通过佩戴特殊的帽子和头饰以示权威。^③ 神庙祭司既是帕尔米拉人宗教生活的领袖，其自身也属于城市精英阶层。帕尔米拉葬礼肖像群中的单人祭司像集中展现了祭司在帕尔米拉社会中的重要地位，^④ 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祭司能够参与政治决策，^⑤ 从而对城市商业施加影响。祭司不仅与商队首领关系密切，还通过传达神谕的方式影响帕尔米拉商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作为城市主神的贝尔被帕尔米拉各部落所尊敬，贝尔神庙的首席祭司便是地位最高的宗教权威，领导帕尔米拉所有神职人员。^⑥ 一份出土铭文记载了帕尔米拉商队首领赛普提米乌斯·沃洛德（Septimius Worod）

-
- ① Jean Jacques Waardenburg, *Islam: Histor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Religion and Reas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2, pp. 405 - 436.
- ② Paolo Fabbri, Manar Hammad, *Bel/Palmira: Hommag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2016, p. 81.
- ③ Hans Gerhard Kippenberg, *Struggles of Gods: Papers of the Groningen Work Group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4, p. 179.
- ④ Rubina Raja, "Representations of Priests in Palmyra: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Priesthood in the Funerary Sculpture from Roman Period Palmyra," *Religion in the Roman Empire*, Vol. 1, No. 2, 2016, p. 125.
- ⑤ 神庙祭司从帕尔米拉主要的四个部落中选举产生，这为祭司参与城市政治事务提供了重要依据。参见 Olivier Hekster, Richard Fowler, *Imaginary Kings: Royal Image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5, p. 179。
- ⑥ Sarah Iles Johnston, *Religions of the Ancient World: A Guide*, Lond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96.

在成功带领商队结束冒险后，先后担任了市场监察官（*agoranomos*）和贝尔神庙的首席祭司，^①这一事实表明贝尔神庙的首席祭司很可能本身便是当地颇具名望的商队首领，因此祭司鼓励贸易甚至亲自参与贸易也就不足为奇。此外伊夫卡泉守护神亚日波尔的祭司是神谕的传达者，^②这一职能使得祭司这一群体往往对当地的商贸思想以及来往商队的贸易重心产生影响。其二，帕尔米拉神庙不但借助圣所空间为往来商人提供交流平台、展示社会名流对商队的善举以及解决商人家族间的矛盾纠纷，而且作为商贸活动的重要举办场所发挥作用。神庙作为“商队旅馆”的延伸，为商人提供食宿，因此帕尔米拉神庙在长途贸易中具有信息交换、商贸裁决、商品交换和贸易补给多重职能，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帕尔米拉神庙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来鼓励商队贸易，大大加速了帕尔米拉商贸信任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帕尔米拉神庙为来往的商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互动平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可以在这里接触并交换信息。对外来商人而言，若家乡的神灵在帕尔米拉神庙供奉范围内，那么他自然而然会对帕尔米拉神庙产生好感，从而利于双方商人建立友谊；即使圣殿内部没有熟悉的神灵，神庙本身也会作为一个公共交流空间发挥作用，而且圣所宏伟庄严的建筑总能令身处其中的人心生敬畏，^③在这样肃穆的环境下双方进行的交流往往是友好和睦的。对帕尔米拉商人而言，神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心，许多重大活动，例如节庆市场、圣日游行、宴会庆典等都在这里举办，圣殿内部的装饰浮雕和壁画同样会对帕尔米拉人产生重要的精神影响。^④ 栖息之所的神庙对帕尔米拉商人有着独特的意义，它们不仅为出行在外的帕尔米拉商人提供了精神慰藉和庇护之所，而且为培养帕尔米拉商人间的信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体而言，帕尔米拉神庙不仅有助于外来商人和本地商人之间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商业联系，更有利

① Gary K. Young, *Rome's Eastern Trade: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Imperial Policy, 31 BC-AD 30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53 - 154.

② Ted Kaizer, *The Religious Life of Palmyra: A Study of the Social Patterns of Worship in the Roman Period*, Stuttgart: F. Metzner Verlag, 2002, p. 69.

③ 例如帕尔米拉门廊的设置，从昏暗的廊道到布满阳光的圣殿庭院，光和影的强烈变化和对比是信徒在游览大型圣所的奇妙体验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元素。

④ Arthur Segal, *Temples and Sanctuaries in the Roman East*, Oxford: Short Run Press, 2013, p. 59.

于加强帕尔米拉商人对母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推动帕尔米拉商业信任网络的构建与扩展。

与此同时,帕尔米拉神庙通过设立雕像、镌刻铭文等方式,激励城市商贸活动。神庙空间中展示的雕像与铭文,是对获得信誉者最好的宣传与担保。从事长途贸易的帕尔米拉人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其商业信誉,从而巩固了帕尔米拉商人在跨区域贸易中的地位。如贝尔神庙的铭文所示,巴比伦尼亚的商人们为科马雷部落(Beni Komare)的商人马尔库(Malku)建造了一尊雕像,因为马尔库乐善好施,并出钱建造了贝尔圣殿。^①帕尔米拉商人的善举被镌刻和展示在神庙中,对商人而言意味着宗教对贸易的认可以及商人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得到表彰的帕尔米拉商人在整个商业网络中的知名度提高,一方面“名人效应”和高额收益促使更多的帕尔米拉人从事商贸活动,商贸网也随之延伸;另一方面神庙由于得到更多的捐赠地位上升。由此,帕尔米拉神庙与商队、商团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神庙积极支持商人经商,商人获利后将财富捐赠给神庙,神庙扩大资产的同时会进一步加强对商贸行为的引导和激励。

第二,神庙是解决商业纠纷的重要场所。帕尔米拉主要部落大多参与了跨区域商业贸易,这些商业家族与神庙渊源深厚。作为帕尔米拉城市部落之一的加迪波尔部落(Beni Gaddibol)与美索不达米亚商队关系密切。加迪波尔部落的阿卡伊曾担任帕提亚境内沃洛吉西亚斯城的帕尔米拉商人领袖。^②公元108年阿卡伊还向贝尔神庙捐赠了一扇门。^③参与长途贸易的玛塔波尔部落(Beni Mattabol)与阿苏崇拜及其神庙有着特殊的联系,^④而科马雷部落与阿格里波尔崇拜和马拉克贝尔崇拜密切相关。^⑤根据帕尔米拉铭

① Delbert R. Hillers, Eleonora Cussini, *Palmyrene Aramaic Texts*,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9, No. 0197.

② A. Maricq, "Classica et Orientalia 7. Vologésias, l'emporium de Ctésiphon," *Syria*, Vol. 36, 1959, pp. 264 - 276.

③ Delbert R. Hillers, Eleonora Cussini, *Palmyrene Aramaic Texts*,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3, No. 0263.

④ Delbert R. Hillers, Eleonora Cussini, *Palmyrene Aramaic Texts*,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5, No. 0321.

⑤ Ted Kaizer, *The Religious Life of Palmyra: A Study of the Social Patterns of Worship in the Roman Period*, Stuttgart: F. Steiner Verlag, 2002, pp. 75 - 77.

文记载,公元21年科马雷部落的哈萨索斯(Hasasos)受到了其部落和玛塔波尔部落的共同尊敬,因为他为两个部落间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卓越贡献。^①这两个主要的城市部落都参与了美索不达米亚贸易,而且它们在重要商业据点帕尔米拉的商人团体中有着极其突出的地位。^②由于哈萨索斯的调停,两个部落在它们共同建造的贝尔神面前解决了争端,^③这次争端可能与两个部落各自的贸易范围冲突有关。在这一事件中,贝尔神庙既充当了裁决部落经济纠纷的场所,又作为城市极其重要的公共空间展示了商业家族间的和睦关系。贝尔神庙的经济裁决功能有利于帕尔米拉商队贸易稳定持久地发展,因此神庙也是帕尔米拉人商业信誉网络重要的空间象征,哈萨索斯扮演的角色为帕尔米拉的社会名流提供了商业善举的典型范例。

第三,神庙通过节庆活动直接参与贸易。商贸活动大多以永久性贸易区域或周期性节庆市场的形式在神庙内部空间中出现。这类商贸活动的主要特点是神庙具有较高的参与度,通过出租场地、派遣神职人员监管活动、接受以贡品形式献予神庙的商品等方式参与到贸易行为之中。举行商贸活动的神庙通常是所在地区或城市中面积最大的神庙,这类神庙既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知名度较高的神灵节日来吸引区域内的信徒和商人。^④《叙利亚女神》记载了近东地区神庙的节庆市场:“在庙宇中……许多货物来自阿拉伯、腓尼基和巴比伦,还有的商品来自卡帕多西亚、西里西亚和亚述……因为没有其他国家在这里指定过这么多节日。”^⑤该记载表明罗马东部行省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经济联系,来自不同地

-
- ① Delbert R. Hillers, Eleonora Cussini, *Palmyrene Aramaic Texts*,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3, No. 0261.
- ② Leonardo Gregoratti, “Temples and Traders in Palmyra,” in Paul Erdkam, Koenraad Verboven, Arjan Zuiderhek, eds., *Capital,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e Roma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471.
- ③ 公元19年,帕尔米拉商人和塞琉西亚的希腊商人一起为玛塔波尔部落的耶迪贝尔竖立了雕像;公元24年,巴比伦商人为科马雷部落的马尔库竖立雕像。这二人都因给新建贝尔神庙捐款而被奠基铭文所称赞。不仅如此,科马雷部落的哈萨索斯家族也与贝尔神庙有着密切的关系。参见 Delbert R. Hillers, Eleonora Cussini, *Palmyrene Aramaic Texts*,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9, 75, 176。
- ④ Ramsay MacMullen, “Market-Days in the Roman Empire,” *Phoenix*, Vol. 24, No. 4, 1970, p. 336.
- ⑤ J. L. Lightfoot, *Lucian: On the Syrian Godd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53.

区的货物通常会在神庙内部的节庆市场上出售。出土于阿拉多斯(Arados)的宙斯·贝托凯斯(Zeus-Baetocaece)神庙的铭文是罗马近东地区商业和宗教结合最明显的例子:“在神圣的市场日,所有的货物必须在报备城市和乡村的市场管理人员后,才能出售;城市市场人员不得以征用、征税、征收或开垦为借口干涉或压迫他们。”^①该铭文表明节日市场在当地非常受重视,城市官员必须参与商品售卖过程,以保证市场秩序和交易有序进行。

上述记录为罗马近东神庙的商贸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帕尔米拉神庙的情况比较特殊,宗教宴会请柬^②证明纳布神庙存在一个由官员监督的节日市场。^③而作为城市宗教生活中心的贝尔神庙在这方面的考古材料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尔神庙不存在节庆市场。因为无论是从圣殿的规模看,还是从所举办的宗教节日知名度看,贝尔神庙都比纳布神庙更适合举办商贸活动,而且贝尔神庙拥有可以容纳100~150人的宴会厅。^④萨兰德认为,贝尔神庙的市场日最有可能发生在尼桑月(4月),^⑤商队在夏季从帕尔米拉出发前往波斯湾和印度,然后在第二年的3~4月回到帕尔米拉。^⑥市场日与商队从查拉克斯·斯帕西努港回来的时间是一致的。因此,帕尔米拉神庙4月的节庆市场很可能是为了庆祝商队顺利回归和销售商队从印度与波斯湾带来货物设立的。这种节庆市场利用其巨大的商业影响力,成为帕尔米拉城市巨额财富的来源之一。

第四,神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商队旅馆的职能,其贸易补给功能为帕尔米拉商贸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商队旅馆也称驿站,是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商贸往来的中继站和补给站,为地区之间物质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基

-
- ① Jean-Baptiste Yon, *Inscriptions Grecques et Latines de la Syrie. Tome XVII-fascicule 1. Palmyre*, Beyrouth: Presses de l'Ifpo, 2012, p. 396, No. 4028.
 - ② Harald Ingholt, Henri Seyrig, Jean Starecky, Andre Caquot, *Recueil des tessères de Palmyr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nthner, 1955, p. 89, No. 687 & 688.
 - ③ J. T. Milik, *Recherches d'épigraphie Proche-Orientale*, Paris: Geuthner, 1972, pp. 59-62.
 - ④ Rubina Raja, "Cultic Dining and Religious Patterns in Palmyra: The Case of the Palmyrene Banqueting Tesseræ," *Antike. Architektur. Geschichte: Festschrift Für Inge Nielsen zum*, Vol. 65, 2015, p. 187.
 - ⑤ Michal Gawlikowski, *Palmyre VI, Le Temple Palmyrénien. Étude d'épigraphie et de topographie historique*, Warszawa: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73, pp. 82-83.
 - ⑥ Eivind Heldaas Seland, *Ships of the Desert and Ships of the Sea: Palmyra in the World Trade of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C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6, pp. 60-61.

本条件。^① 帕尔米拉的商队旅馆型神庙一般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以井水、泉水或蓄水池形式提供的水资源，可供商人们进行交流和贸易的空间，为动物准备的围栏场地，等等。这些神庙在支持长途贸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叙利亚沙漠、撒哈拉沙漠或阿拉伯内陆等环境恶劣的地区，它们为商团或个体商人提供了重要庇护与物资补给。充当商队旅馆的神庙在选址上大多接近水源和主要道路，使神庙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接收大量人口和牲畜，并为他们的生存提供基本保障。神庙发挥的补给作用也意味着这类型神庙通常出现在城市外围而非城市中心，它们不仅扩大了城市的外延，还缓和了定居人口和游牧民族间的关系，因为神庙提供了对双方都极具价值的水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类型神庙是帕尔米拉与骆驼游牧民族长期合作的前提条件。^② 这些商队旅馆型神庙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罗马帝国后，有的成为长途贸易中的补给站，有的成为新城市社区所在地。商队旅馆型神庙是帕尔米拉商贸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帕尔米拉神庙充当商队旅馆的典型例证是杜拉·欧罗普斯的墓地神庙。^③ 作为帕尔米拉东部的邻居，杜拉长期以来是帕尔米拉长途贸易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铭文证明早在公元前33年双方就存在密切的联系。^④ 墓地神庙位于杜拉城的西北部，远离城市中心且直接面向西北方向的帕尔米拉，神庙东北角有一个巨大的水井，旁边的空地很可能是动物及其随行人员的休息场所，^⑤ 墓地神庙的设计规划与商队旅馆型神庙的特征完美契合。

-
- ① 王泽壮、李屿萌：《伊朗萨法维时期驿站建设及功用》，《经济社会史评论》2021年第2期，第57页。
 - ② Eivind Heldaas Seland, "Camels, Camel Nomadism and the Practicalities of Palmyrene Caravan Trade," *ARAM Periodical*, Vol. 27, No. 1, 2015, p. 49.
 - ③ 杜拉·欧罗普斯地区有三座帕尔米拉宗教建筑，一为集市附近的盖德神庙（Temple of the Gaddè），二为宙斯·基里奥斯-巴尔夏明神庙（Temple of Zeus Kyrios-Baalshamin），三为一座位于杜拉西北部墓地内部且没有城墙的神庙（The Temple in the Necropolis），这座墓地神庙建于公元前1世纪末，并于公元2世纪后半叶扩建。参见 Ted Kaizer, *The Religious Life of Palmyra: A Study of the Social Patterns of Worship in the Roman Period*, Stuttgart: Ftzanz Steiner Verlag, 2002, p. 160.
 - ④ Delbert R. Hillers, Eleonora Cussini, *Palmyrene Aramaic Texts*,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69, No. 1067.
 - ⑤ Lucinda Dirven, *The Palmyrenes of Dura-Europos: A Study of Religious Interaction in Roman Syria*. Leiden: Brill, 1999, p. 32.

此外，墓地神庙在公元2世纪得到了扩建，^①这个时间点与帕尔米拉商队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和波斯湾地区的活跃时间高度一致，因此这座神庙很可能是为杜拉和帕尔米拉之间往来的商队设立的，其本身建有保障饮水和安全的基础设施，同时还存在容纳商旅、动物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依托帕尔米拉贸易网络发展的商队旅馆型神庙的基础设施也不断升级。不仅如此，帕尔米拉周边的小型村落遗址也提供了帕尔米拉神庙区域辐射力的考古证据。塞里亚内（Seriane）是位于帕尔米拉西北12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②该遗址有一座小型罗马神庙，神庙内部有大片空地和一个蓄水池，这与杜拉·欧罗普斯墓地神庙的设计有着极高的相似之处。神庙内阿波罗的雕像暗示着对纳布的信奉，^③帕尔米拉也有一座纳布神庙，这事实上反映了双方存在一些宗教方面的联系。考古发现表明生活在那里的人口相对富裕，^④塞里亚内神庙很可能位于帕尔米拉全盛期的经济辐射范围内，并在帕尔米拉贸易网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商队旅馆型神庙在帕尔米拉商业殖民地中比较常见，但是城市内部的阿苏神庙同样扮演了这一角色，阿苏神庙是距离商人交易场所最近的神庙，广场发挥的经济作用必然会对其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戴克里先城墙外一些重要的围栏被确定为商队旅馆旁的骆驼圈，^⑤这与同一地区的阿苏神庙关系密切。

四 汇聚与发散：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的影响与贡献

帕尔米拉神庙贸易对城市本身的繁荣、区域商贸网络的形成发展和罗马帝国的经济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就城市内部而言，神庙贸易反映了神庙在帕尔米拉宗教和经济生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展现了神庙在这座商队城

① John Berkeley Grout, *The Role of Palmyrene Temples in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Roman Near East*, London: Royal Holloway and Bedford New College, 2016, p. 236.

② John Berkeley Grout, *The Role of Palmyrene Temples in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Roman Near East*, London: Royal Holloway and Bedford New College, 2016, pp. 213 - 214.

③ Arthur Segal, *Temples and Sanctuaries in the Roman East*, Oxford: Short Run Press, 2013, p. 76.

④ R. Gogräfte, "The Temple of Seriane-Esryi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Vol. 42, 1996, pp. 179 - 186.

⑤ Jean-Marie Dentzer, "Khâns ou casernes à Palmyre? À propos de structures visible sur des photographies aériennes anciennes," *Syria*, Vol. 71, No. 1, 1994, pp. 45 - 112.

市中的强大影响力，提高了城市精英群体的声望和社会地位，推动了帕尔米拉城市多元文化景观的塑造。就神庙参与商贸而言，日渐频繁的商贸活动和以神庙为载体的贸易支撑体系共同发挥作用，促使帕尔米拉商人社区在近东地区其他贸易节点城市大量出现并持续发展，贸易离散社群扩大了帕尔米拉商贸网络的辐射范围。就神庙贸易影响而言，帕尔米拉是罗马帝国东部边境的战略性商贸城市和地中海—波斯湾之间的商贸重镇，其繁荣的神庙贸易大大增加了罗马帝国的税收收入。

神庙贸易对帕尔米拉产生的重要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神庙贸易巩固了神庙作为帕尔米拉城市中心场所的地位。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位于柱廊大道东侧的贝尔神庙和建于1~2世纪的纳布神庙、阿拉特神庙、巴尔夏明神庙分别位于城市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而与贸易密切相关的阿苏和拉巴西尔神庙则位于城市中心，这些神庙在商贸活动中能够辐射整个帕尔米拉城。帕尔米拉神庙是城市宗教中心，神庙作为信徒进行神灵崇拜和祭司开展宗教活动的圣地，集中展示了帕尔米拉丰富多彩的宗教生活。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建筑，供奉城市主神的贝尔神庙决定了城市主干道的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城市规划，对帕尔米拉人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帕尔米拉神庙在城市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一现象是由帕尔米拉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尽管从公元1世纪下半叶开始，这座城市在公共文书中自称城市国家（*cite*）或城邦（*polis*），^①但部落始终都是帕尔米拉社会的核心，信奉不同神灵的部落是帕尔米拉社会的组成单元，地位非凡的神庙大祭司作为部落守护神的人间代理人，不仅在政治上积极参与城市政策法令的制定，也深度参与了对帕尔米拉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商队贸易。^②

其次，在罗马的近东长途贸易中，帕尔米拉神庙利用其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积极鼓励民众经商，并通过举办节庆市场和建设商队旅馆的方式直接参与商业贸易。神庙贸易凸显了商业对于帕尔米拉城市文明的重要

① [法] 保罗·韦纳：《巴尔米拉：一座失落的罗马边城》，闫素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第76页。

② Andrew M. Smith II, *Roman Palmyra: Identity, Community, and State 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22.

性,这一事实主要通过城市景观来展现。帕尔米拉的城市景观由公共和私人建筑两大部分组成。神庙、广场和柱廊大道作为帕尔米拉主要的公共建筑,都设计了雕像放置台(consoles),这是帕尔米拉的城市特色,主要用途是表彰帮助过商人或商队的同胞。广场是商人信息交流和商品交换的主要场所,有专门的官员在此监督商业活动;而柱廊大道由300多根9米高的柱子构成,^①为与商业关系密切的精英群体提供了自我展示的最佳空间。^②在以墓室为代表的私人建筑中则发现了除罗马以外数量最多的古代世界葬礼肖像,^③佩戴宝石项链、手镯与胸针的女性雕像证实了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④这些城市建筑大多在公元1世纪中叶到3世纪中叶建成,它们既源于城市贸易的需要,又受益于贸易获得的财富,亦推动了以神庙为基础的商贸进一步发展。

再次,神庙贸易极大地提高了富有商人和社会名流的威望,参与、资助和保护商贸成为他们入仕的重要途径。尽管吸引商人参与贸易的首要因素仍然是商路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但政府政策使民众逐渐意识到,参与商贸不仅不会妨碍自身获得政治权力和地位,相反会在收获财富的同时提升社会影响力,从而为其担任城市公职奠定坚实的基础。^⑤铭文证实贝尔神庙座谈会的祭司是帕尔米拉最负盛名的公民职位之一,^⑥结合上文提到的商队首领提米乌斯·沃洛德的例子,以及著名的索阿多斯的例子,^⑦我们能够得

① Michael Sommer, *Palmyra: A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177.

② 柱廊大道是帕尔米拉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台基上矗立着帕尔米拉包括商队首领在内的各界社会名流和城市官员的雕像。参见 Richard Stoneman, *Palmyra and Its Empire: Zenobia's Revolt Against Rome*,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 76.

③ Rubina Raja, "Representations of Priests in Palmyra: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Priesthood in the Funerary Sculpture from Roman Period Palmyra," *Religion in the Roman Empire*, Vol. 1, No. 2, 2016, pp. 125.

④ Andreas J. M. Kropp, Rubina Raja, "The Palmyra Portrait Project," *Syria*, Vol. 91, No. 1, 2014, p. 400.

⑤ Andrew M. Smith II, *Roman Palmyra: Identity, Community, and State 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9.

⑥ Delbert R. Hillers, Eleonora Cussini, *Palmyrene Aramaic Texts*,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8.

⑦ 索阿多斯因对商队的帮助广受称赞,公元146年的铭文表明索阿多斯定居在帕尔米拉重要商业殖民地沃洛吉西亚斯,并依靠强大的政治权力,在此地奉献了一座奥古斯都神庙,为往来商人或商团提供便利。参见 Michal Gawlikowski, "Palmyra as a Trading Centre," *Iraq*, Vol. 56, 1994, p. 30.

出确切结论，即在商贸和公共事务中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可以出任重要公职，这对帕尔米拉的商贸发展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总体而言，神庙贸易对那些试图通过经济利益换取政治优势的富有商人和想要借助善举谋求政治声望的社会名流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对于商队首领之外的普通商人来说，参与商贸同样是名利双收的美事。

最后，神庙贸易塑造了城市的多元文化景观。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宽松的信仰氛围和官方政策都释放出了帕尔米拉鼓励和支持外来商人参与商贸的重要信号，这些外来商人也会将自身信仰带到帕尔米拉城内部，商业文化促进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从城市建筑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总体的建设布局，还是具体的建筑风格，都体现了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融现象。帕尔米拉的道路网络采用了希腊化时代常见的城市规划即希波达姆斯式（Hippodamian）布局；^① 贝尔神庙作为城市最重要的神庙集中展现了古代近东和希腊罗马艺术的高度结合。^② 此外，帕尔米拉在受到各方文化的影响下依旧保持了自身的特色。尽管这座城市中的双语铭文数量惊人，但在丧葬领域，阿拉米语仍占据着主要地位；^③ 祭司阶层的平顶祭司帽^④以及帕尔米拉神庙的鱼尾纹装饰和窗户设计^⑤都反映了独特的帕尔米拉风貌。

神庙贸易同样推动了以帕尔米拉神庙为基础的贸易网络的形成与发展。神庙贸易网络并非帕尔米拉独创，而是由近东神庙贸易网络传承、发展而来，尽管帕尔米拉不是神庙贸易网络最早出现的地区，但该网络依托帕尔米拉的商贸活动，在罗马帝国时期发展到高峰。帕尔米拉神庙通过精神和物质双重网络共同推动商队贸易的发展。一方面，神庙作为帕尔米拉人维

① Michael Sommer, *Palmyra: A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172.

② Charles Gates, *Ancient Cities: The Archaeology of Urban Lif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Egypt, Greece and Ro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399.

③ Rubina Raja, *Pearl of the Desert: A History of Palmy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16.

④ Rubina Raja, "You Can Leave Your Hat on Priestly Representations from Palmyra: Between Visual Genre, Religious Importance and Social Status," in Richard L. Gordon, Georgia Petridou, Jörg Rüpke, eds., *Beyond Priesthood: Religious Entrepreneurs and Innovators in the Roman Empi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7, p. 426.

⑤ Arthur Segal, *Temples and Sanctuaries in the Roman East*, Oxford: Short Run Press, 2013, pp. 95 - 100.

持拓展其商贸网络的重要场所,不仅有利于来往商人或商团建立友谊和交流信息,也展示了神庙对城市商业的重视和对精英群体商业善举的支持,还为本地与外地商旅提供了解决经济纠纷的平台;另一方面,神庙为商贸活动提供种种便利,它可与商队旅馆扮演相同的角色,为商人提供食宿和休憩之地,亦可直接举办商贸活动,参与商品交换过程。

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网络主要由城市内部神庙和商业据点神庙构成。城市内部的贝尔神庙、纳布神庙、巴尔夏明神庙、拉巴西尔神庙和阿苏神庙在帕尔米拉长途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业据点的神庙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但后者大多作为商队旅馆而使用,除非帕尔米拉与某些商业殖民地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杜拉城中心的盖德神庙更多地发挥宗教仪式方面的作用。^① 杜拉的墓地神庙、塞里亚内神庙和沃洛吉西亚斯的奥古斯都神庙^②是帕尔米拉神庙充当商队旅馆的代表。此外,科普托斯关于扎布达拉斯的铭文表明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治下的埃及也存在帕尔米拉神庙和商人,^③可以说帕尔米拉贸易网络中的主要场所都至少有一座贸易神庙,这些由商人建造或为贸易服务的神庙,是罗马帝国时期神庙贸易在近东繁荣发展的重要见证。

以帕尔米拉神庙为核心的贸易网络随着帕尔米拉商贸网络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完善,它不仅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重要城市包括其中,甚至延伸到了波斯湾和印度西海岸。在公元2~3世纪,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网络由两河流域拓展到了红海地区。宗教崇拜和血缘关系是维系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网络的主要因素,^④神庙作为宗教崇拜的载体而发挥其精神和物质作用,血缘关系的载体则是帕尔米拉贸易商队社群,因此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网络将

① John Berkeley Grout, *The Role of Palmyrene Temples in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Roman Near East*, London: Royal Holloway and Bedford New College, 2016, p. 238.

② 皇帝崇拜在叙利亚和帕尔米拉的宗教生活中并不突出,因此奥古斯都神庙的建立可能是为了展现帕尔米拉人对罗马帝国的顺从和忠诚。这座神庙由帕尔米拉著名精英索阿多斯建立,结合神庙的位置与建设空间,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神庙为来往商队提供了休憩场所,参见 John Berkeley Grout, *The Role of Palmyrene Temples in 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Roman Near East*, London: Royal Holloway and Bedford New College, p. 228。

③ Jean Bingen, "Une dédicace de marchands palmyréniens à Coptos," *Chronique d'Égypte*, Vol. 59, No. 118, 1984, pp. 355 - 358.

④ Eivind Heldaas Seland, "Networks and Social Cohesion in Ancient Indian Ocean Trade: Geography, Ethnicity, Religio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8, No. 2, 2013, pp. 382 - 383.

城市的宗教、社区和商业完美整合到同一个网络之中。公元 1~3 世纪,以神庙为中心的贸易网络促使帕尔米拉商人所分布的近东城市和港口,如幼发拉底河畔的沃洛吉西亚斯和吉纳斯、波斯湾港口城市查拉克斯·斯帕西努等依托神庙贸易获得快速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个罗马—帕提亚时代近东地区城市的共同繁荣。

帕尔米拉神庙贸易对罗马帝国产生的最直接的经济影响便是税收收入的增加。从印度、阿拉伯半岛等地运往罗马的商品在到达帝国边境时要支付各种各样的关税、通行费以及过路费,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的货物为帝国带来了巨额财富,同时代罗马学者的论述和穆泽里斯纸草证明了这一点。据老普林尼估计,“每年帝国流入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的财富就达到了 1 亿塞斯退斯,光是印度从帝国拿走的财富就达到了 5000 万塞斯退斯”,这个数字相当于奥古斯都时期整个罗马埃及税收收入的 1/5。^① 尽管老普林尼提供的数据存有疑问,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马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之间频繁的商贸往来。穆泽里斯纸草则为我们了解当时罗马与印度的贸易规模以及帝国从中所获贸易收入提供了关键性证据,学者推测纸草所记录的运载货物的“赫玛波隆号”船重量可能达到了 220 吨,^② 这些货物纳税前的总价值约为 900 万塞斯退斯,^③ 斯特拉波记载公元前后每年从米奥斯·荷尔莫斯 (Mios Hormos) 港驶往印度的船只多达 120 艘,若每艘船只所载吨数与其相似,那么公元 1 世纪通过印度洋进入罗马帝国的东方产品每年的价值在 10 亿塞斯退斯左右,这意味着按照罗马对跨境商品征收 1/4 税 (Tetarte),罗马帝国仅从埃及港口进口商品中获得的税收收入就达到了 2.5 亿塞斯退斯,后者几乎相当于罗马帝国早期年财政收入的 1/4。^④ 另有碑文记载从帕尔米拉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的东方货物价值 3.6 亿塞斯退斯,而依据罗马帝国的 1/4 税制,罗马帝国中央和地方政权至少可以从中获得 9000 万

① Richard Duncan-Jones, *Money and Government in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4, p. 53.

② Raoul Mclaughlin,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Indian Ocean*, Great Britain: Pen & Sword Military, 2014, p. 89.

③ Raoul Mclaughlin, *Rome and the Distant East: Trade Routes to the Ancient Lands of Arabia, India and China*,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p. 158.

④ Raoul Mclaughlin,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Indian Ocean*, Great Britain: Pen & Sword Military, 2014, p. 94.

塞斯退斯的税收。^①

结 语

帕尔米拉神庙贸易对城市本身与叙利亚周边地区的城市发展乃至罗马帝国的东方贸易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神庙贸易网络使得以帕尔米拉为中心的大型商业贸易网络充满了活力。商业贸易和神庙经济的良性互动是帕尔米拉经济繁荣的秘诀,因此罗斯托夫采夫在1932年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客观中肯的描述:“神庙和商路、宗教和财富是帕尔米拉最为重要的两大特征。”^②

作为一种独特的贸易形式,帕尔米拉神庙贸易有其兴起缘由,也有其衰落原因。帕尔米拉及其神庙贸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近东地区相对开放的商业环境不仅使这片区域具有了浓厚的商业气息和宽容的宗教氛围,也在事实上推动了跨区域贸易活动的兴起,这种神庙贸易因其所处位置的特殊性而具有了地域独特性。同时,根据格兰诺维特关于网络强度关系的探讨,^③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网络之所以衰落,与该网络对宗教崇拜和血缘网络的依赖密不可分。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网络拥有高度的内聚力,但排外性也很强,帕尔米拉人以外的任何族群都很难真正融入帕尔米拉人的社区,这导致帕尔米拉神庙贸易网络由于缺乏必要的弹性与灵活性很难抵御外部势力的打击,这也与奥勒良洗劫帕尔米拉后其商人活动迹象自此消失的现象完全吻合。^④

简言之,在古代世界,帕尔米拉以神庙为中心的特色贸易网络既有高度的适应性,亦存在明显的脆弱性。帕尔米拉神庙通过多种方式参与东地中海—波斯湾地区的跨区域商贸活动,有力带动了公元1~3世纪罗马帝国

① [英]拉乌尔·麦克劳克林:《罗马帝国与丝绸之路》,周云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第274页。

② M. I. Rostovtzeff, *Caravan Cities: Petra, Jerash, Palmyra, Dur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2, pp. 125 - 132.

③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 6, 1973, pp. 1360 - 1380.

④ Eivind Heldaas Seland, "Networks and Social Cohesion in Ancient Indian Ocean Trade: Geography, Ethnicity, Religion,"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8, No. 2, 2013, pp. 382 - 383.

东方城市乃至丝绸之路西段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公元 3 世纪后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分裂以及萨珊帝国主导下东地中海—波斯湾贸易格局的重组，商贸城市帕尔米拉的重要性亦随之下降，曾经繁荣辉煌的沙漠明珠遂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和沉寂。

[责任编辑：龙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